

浅析陕北“三边”教案

张雪梅 席涛

(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中国近代教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控制了包括陕西、内蒙古地区在内的鄂尔多斯地区,并开始在这里传播天主教义,长期欺压当地百姓,掠夺土地、财产,种种丑恶行径激起了当地广大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抗,最终酿成“三边”教案。“三边”教案是一种反对西方传教士侵略,抵制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传播,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反洋教斗争。与之相关联的近代中国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对列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斗争的结果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光辉依旧。

关键词: 陕西;“三边”教案;反洋教斗争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7)02-0054-04

爆发在中国内地的数起“教案”不是指一般性的正常传教事务,而是指专门通过传教的目的进行侵略活动的政治性事件。受西方列强支持或派遣的传教士充当着西方列强侵华的急先锋,他们企图将整个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纳入他们的殖民侵略“事业”中。事实证明,传教士成了英帝国了不起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作^{[1] P126}。诺尔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那些所谓的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基督教会的侵略本质。外国传教士的种种暴行,理所当然地激起当地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其中,尤其是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帝反洋教运动,早已超越了农民运动的范畴,有力地阻止和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华热潮,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反洋教运动,陕西的“三边”教案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一、“三边”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17世纪初叶,陕西就有了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当时陕西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区域。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势力作为列强侵华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得以迅速发展。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教会(主要是天主教)势力已经侵入到陕西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已经出现了比利时的传教士。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从19世纪接替了法国遣使会后开始在这个区域内活动。圣

母圣心会主教派遣费尔林顿、德玉明和司福音神父到鄂尔多斯区域内的蒙古地区和陕北“三边”地区传教。“三边”是指陕西省北部的定边、靖边和定边县所属的安边堡一带地方。定边的安边堡和靖边口外的宁条梁两地东西相距60华里。安边堡东北70华里为鄂托克旗南端未开垦的牧区城川。安边堡附近农产丰富,宁条梁以北的城川畜牧业繁荣,因为两地交通方便、商贾云集。这个由安边堡和宁条梁中间的白泥井滩、宁条梁以东的小桥畔滩及其以北的城川滩所构成的地区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陕北三边口外传教的基本区域。比利时圣母心会在陕北三边口外传教主要有两个据点:一个是以靖边口外的宁条梁为中心的小桥畔教堂;一个是以安边堡东北之鄂托克旗南端未开垦牧区为中心的城川教堂。这两个地区主要分布有汉蒙两民族。汉族人主要分布在宁条梁一带,而城川一带则有不少蒙古族人^{[2] P53}。

当时的靖边县小桥畔教堂,是陕西省最大的教堂之一。小桥畔在宁条梁东南15华里的无定河上游东岸,小桥畔教堂的礼拜堂颇具特色。它未采用西洋建筑的形式,而是把蒙古喇嘛庙、汉人佛庙和回民清真寺建筑特点融合为一体建成的全新东方式建筑,用中国式的神龛供着耶稣神像。整个教堂完全用朱漆立柱支撑,地下铺着地毯,顶上是非常华丽的彩绘天花板^{[2] P55},修建十分豪华,是当时该地区最为壮观的建筑。

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由绥远

到靖边县所属的宁条梁地区传教。起初他们在宁条梁南沙口地方租赁民房而居,建立了南沙口教堂,不久便“一边是大量购买土地,用土地、籽种、牛犏作诱饵,吸引周围群众入教,一边则勾结当地土豪劣绅欺压不入教的群众”^[3 I P429]。他们在小桥畔教堂一带租、开土地就达五千二百多垧(约合二万多余亩)^[4 I P119],甚至在定边县北到城川口的大片膏腴之田,也被这些传教士“买去了多半”。当地有识之士对此情景惊呼:“设不严重交涉,数十年后,汉蒙耕地恐尽归入外人势力范围。”^[5 I P16]教会大量占地之后,便开始欺骗当地贫苦农民入教,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手段的压迫。光绪十一年,传教士在买定大批土地、修筑房屋、建立教堂后,又开始在教堂四周修筑寨墙,以作防卫。“小桥畔教堂在周围筑有土寨一座,长达一百六十丈,墙高二丈,底宽一丈五尺,收顶宽六尺”^[6 I P17],深沟环绕,俨然一座城堡。到了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三边”天主教势力有了更大发展,其中小桥畔教堂共管辖六所教堂。靖边县境内自小桥畔起,到城川口止,共有教民七十一户,三百余口。当时“三边”天主教堂,在长城以外者属于宁夏三盛公教区,在长城以内者则属于延安教区,总计有教堂十九所,区主教设在城川。此外,小桥畔、堆子梁、白泥井各设本堂一所,毛团库仑、西白泥井,各设分堂一所,沙渠、大阳湾、硬地梁、伊当弯、毛家窑子、沙路茆子、仑房梁、红沙石梁、白土岗子、黑梁头、小疙瘩、圪丑、场子壕等地各设公所一处,教士多为比利时和荷兰籍^[6 I P209]。这便是当时“三边”教会的大概状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天主教教堂内“拥有大量武器弹药,并私设法庭,动辄拘捕无辜百姓,轻则辱骂,罚款,重则鞭挞,监禁,以至处死,县民恨之入骨,蒙民的仇恨更深”^[3]。1898年,二百多名蒙古人围攻宁条梁白泥井教堂,险些酿成重大教案,说明那时陕西“三边”地区的冲突已经很严重了^[2 I P56]。

二、反洋教运动的爆发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点燃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火,“三边”地区的人民积极响应。是年春,山东义和团一个名叫张成德的首领来到了靖边县宁条梁进行反洋教宣传,宣称能教男子“焚香念咒可以抵抗枪炮”,能教女子学习“红灯照可以腾空驾云”^[3 I P429],深得当地人民信任,因而被当地人称为“能人”。但是不久以后,张成德因事回山东,宁条梁又来了一位自称奉“能人”之命,从泰山来传教的青山道人。他开始在宁条梁刘福兴店内设坛传授法术,当时参加的男女青年达到100多人,大家跟其学法术的同时,共同谋议反洋教之事。深受洋教士压迫的当地群众早就想脱离教务的束缚和限制,因此这个举动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夜^[3 I P210],义和团成员会合鄂托克、乌审两旗的蒙兵400多人,以及安边李鞋匠带领的20多人和自发而来四乡群众300多人共同攻打靖边小桥畔教堂。当时整个庞大的队伍高举火把将教堂团团包围,但是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队伍中的火把引着了寨外的草垛,一

时风吹烟起,四处照射如同白昼。目标被暴露后,引起了教堂内传教士的恐慌。作战开始后,义和团成员个个奋勇善战,冲锋在最前面。当地群众也积极配合战斗,其中深受传教士压迫的定边乡民李鞋匠头顶铁锅,身披牛皮,一直冲到了寨门口杀敌,却不幸英勇牺牲^[7 I P90]。蒙兵更是骁勇善战,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到最后也渐渐落入下风,这些传教士拿出藏在教堂内的长短洋枪,疯狂地向义和团队伍扫射。义和团、蒙兵以及“三边”地区的百姓由于武器装备上的落后,遂屡次向教堂发动攻势终不能迅速攻克寨墙,最后双方进入了相持的状态……义和团、蒙兵和当地群众围攻靖边小桥畔教堂达48天之久,屡次展开激战,但是最终仍然未将教堂攻克。这次发生在“三边”地区的反洋教运动最终经查证:“计烧拆大教堂四处、教民房屋六百二十一间,掠夺牲畜三千余头、粮粟一千三百余石、杀毙洋教士一名、教民十名。”^[8 I P105]此举沉重地打击了“三边”教会势力。

三、“三边”教案的失败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那拉氏和光绪帝逃到西安。到了西安,以那拉氏为代表的清末反动统治者即刻便暴露出其丑恶的嘴脸,接受了同帝国主义的议和。那拉氏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解除民间势力的威胁,下令对义和团“严加剿除”。当时陕西省巡抚派刘少涵带队来到“三边”镇压,随即命令蒙兵立即撤至城川。蒙兵一撤走,义和团也就势单力薄,围攻教堂的群众开始自行解散,义和团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三边”人民的此次反洋教斗争失败后,教会势力更加嚣张,要求清政府力保“三边”教堂,严办教案的参加者^[4]。教堂又私设法庭,大肆逮捕群众,受刑者达百余人,对支持过义和团的群众亦不放过。永盛号商店曾为义和团设坛处,被罚银三千两,使其被迫倒闭;支持过义和团运动武器的陈元善,被罚银八百两;捐给义和团土枪二枝的郭怀义,被罚银三百两^[7 I P89-91]。其中法帝国主义更是借口此次教案打死的一名洋教士,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命价和一切损失。此时的清朝政府当局畏敌如虎,害怕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就对此要求惟命是从,命令当时陕西巡抚处理此事。

陕西巡抚即派陕西绿营协统刘少涵会同宁夏布都、安边二府和定靖两县知县出面调停,以地方事件进行解决。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鄂托克、乌审、札萨克旗和天主教堂签订赔款条约,条约中处处体现着丧权辱国。因为该条约的签订地点位于靖边县宁条梁,所以后来一般称其为“三边教案和约”。“三边教案和约”中的规定使毗邻靖边县一带的内蒙古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丧失了大批白银和土地,“……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内蒙员误会上谕带兵闹教一案,今该蒙长贝子等,自知悔悟,情愿讲和议赔……”^[3 I P506]。其中规定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赔偿给教堂白银达十四万三千五百两。“……共议三旗烧拆城川口、硬地梁、小石砭、科巴尔大教学四处……是为一宗;掠夺教堂及教民牲畜,大小约三千头,是为一宗;粮米约梁斗一

千三百数十石,是为—宗,伤毙教士—人,教民十人,是为—宗,以上四宗,连乌审旧案,共索赔十七万八千五百两有奇……除推情减让银三万五千两有厅,今议定交银十四万两。又有乌审旗下历年与洋教堂教民等争闹,拔须、扯衣、烧房三案,共议赔银三千五百两,归入此案并结……^{〔3〕 P506}。在这十四万三千五百两白银里,乌审旗分担四万五千五百两,因无款可筹,将大淖碱池作押,“……惟乌审—旗,应认三成银四万二千两,其本旗旧案三件,专认赔款三千五百两,共银四万五千五百两。商以大淖儿碱池暂作押当,分作三限交清……^{〔8〕 P245}”。鄂托克、札萨克两旗承担九万八千两。除已付三万四千两外,尚欠六万四千两,后天主教堂强迫鄂托克旗郡王以边墙外原划归汉民耕种的土地,作为赔款抵押。这片土地西起白泥井,东至伊当湾,东西长约三百六十里,南北宽约七十二里,面积约二万五千九百二十方里。此后,教会实际上控制了“三边”地区,他们公然干涉地方行政,自订法规,擅设法庭,组织武装,俨然“国中之国”^{〔4〕 P120}。

面对如此巨大的耻辱和损失,当时腐败的清朝政府仍然希望蒙汉部与洋教释怨解仇,言归于好。然而清朝统治者的卖权求荣和帝国主义教堂的镇压并没有止息“三边”人民的反抗斗争,随后在1903年又有反抗统治的起义发生。据《秦中官司报——秦事汇编》甲辰三月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定边客民任天绪与靖边县民耿作、张彪等谋划起事,有王木匠、郭木匠、高士英等联合,造印信文件、旗帜号衣,“分送蒙人,约期会兵举事”,后因蒙兵札拉呼厅给教堂报告,事未举而泄密,任天绪、耿作、高士英三人被“就地正法,传首示众”。虽如此,“三边”一带仍有反教势力的存在,显示出民间反教心理的普遍性和持久性。

四、教案爆发的原因分析

义和团运动时期爆发于陕西北部的“三边”教案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作为陕西典型的三个教案之一。那么,当时的陕北“三边”为什么能够掀起如此巨大的对抗与斗争呢?

首先,外国教会势力对“三边”地区人民的疯狂侵略和镇压是“三边”教案爆发最直接的原因。比利时天主教势力依仗比利时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陕北和内蒙接壤一带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践踏和奴役当地人民,侵害当地人民的权益。这些教会势力在宁条梁一带大量掠夺土地,使老百姓没有多余的耕田种地,并且强迫当地农民入天主教,私自设立法庭,动辄拘捕扣押,当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教会严禁当地群众在教会占有的山岭、牧场中采薪放牧,只要群众的牲畜踏进教会的田地,即被罚米五斗^{〔4〕 P118}。还有一位教民张卯在自己家门口抽烟歇息,适逢比利时神甫甘士英路过,张卯因未看见而没有行礼,甘士英即诬陷张要谋杀神甫,送之官府,要求重惩。张被搞得倾家荡产,几至丧命^{〔9〕 P284}。更有强迫教民把女儿送入教堂作“修女”供教士玩弄等许多让百姓忍无可忍的案例。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和蒙兵的影响下,深受教会压迫与奴役的群众积极响应,斗争

一触即发。

其次,在当时的陕北“三边”地区内,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整个社会的传统思想,儒学教条是社会里不可逾越的经典,是维护封建宗法家长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如若谁敢违背此法,就是“非圣之法”、“大逆不道”,被看成是“异端”分子。比利时教士来到“三边”地区后,逼迫当地群众信仰天主教,信仰耶稣,不准教徒尊崇孔孟,严重破坏了中国封建政教,动摇了封建社会的伦理基础,因此遭到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当山东义和团一个叫张成德的首领来到靖边宁条梁进行反洋教宣传时,便能立即取信于当地人民。继后从泰山来的青山道人也能及时收揽民心,正是由于当时老百姓的意识形态里仍然渴望维护封建礼俗政教和千百年来深植于民心的古老的传统精神信仰。尽管有时他们不理睬那一套“圣教”或“非圣教”的思想是非,但是他们反对并予以打击的正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侵略者的物质利益。所以对“三边”的人民而言,反对洋教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最后,“三边”教案的爆发与义和团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教会势力与陕西当局反动统治者相互勾结,共同压迫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陕西地方官势力奴气十足,接受教会提出的无理要求,袒护天主教会,欺压当地百姓。对此,广大群众对教会势力的仇恨平日只能积于心头,但是,反抗的怒火却如岩浆一样在地下运行。一旦遇到合适时机,即会像火山一样,异常猛烈地喷发出来^{〔10〕 P286}。义和团的风暴正好为群众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提供了合适的时机。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首领张成德来到靖边县宁条梁向当地人民进行反洋教宣传,张成德回到山东后,又派一位法号“青山”的道人来到宁条梁继续活动,鼓动群众反对洋教,练武对付洋人,参加者达到百余人。青山道人离开后,当地义和团群众又自推首领,主持坛事,领导反教会斗争,几个月后,就爆发了“三边”教案。

五、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评析

陕西“三边”教案,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教案,有其典型性。然而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历时很长,差不多跨越整个19世纪下半叶,分布也很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地区,次数也很多,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仅就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而论,就“共达四百余起”之多^{〔11〕}。因此,“三边”教案的爆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其中的共性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的。

近代中国的任何革命或运动,都是由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造成的,反洋教斗争也不例外。以“三边”教案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自始至终贯穿着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斗争。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日益发展并且几近遍布中华大地的反洋教斗争。王守中先生在《略论反洋斗争的矛盾问题》中坦言:“不管外国教会是如何标榜‘宗教是脱离政治’的,但天主教的海外传播史却证明,西方教会的向外传播,从来就是和国际上的强权扩张相联系的。”

特别是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为了加速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直接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手段,而派遣传教士就是这种文化侵略手段的具体实施。所以说,外国传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帮助帝国主义搞侵略活动,充当其侵略的急先锋。早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曾指出:“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心。”^[12]并且指出“夫国家治安天下,以固人心为本”,而“今既准其传教,愚民无知,易受笼络。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如此下去,必须动摇中国的“邦本”^[12],由此可见其对于中国的危害。因此,人们在进行反洋教斗争时,总是和反对外国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打击西方传教士的同时也在反对西方的侵略者。所以根据反洋教运动的社会矛盾与其传教士的侵略实质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包括“三边”教案在内的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洋教运动都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在我国反帝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从陕北“三边”教案的爆发看反洋教斗争,其主流是应当肯定的。

然而,无庸讳言,“三边”教案以及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洋教运动,也有其较大的局限性。首先是历史的局限性,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应比较迟钝,在短期内不容易激起全民族同仇敌忾。整个中国近代的反洋教斗争认识的局限性,带来了斗争的局限性,这是运动未能更大发展的思想原因。其次,中国人民反洋教的目的,就其内涵意义来说,在于“扶清灭洋”,也就是义和团运动的总体口号。消灭洋教,捍卫国家主权及孔教的最高体现者和代表者清王朝,这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却忽视了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清王朝的本来面目——“防民甚于防寇”,当借民力反洋教到达一定程度时,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清王朝依附于列强的地位也随之加深,不得不改变其统治政策,剿灭义和团,压制人民的力量,使得如同陕西“三边”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多以失败告终。最后,这些反洋教斗争都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领导,都是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所以导致斗争的盲目和散乱,在反动统治的镇压下,各个击破,最终以失败结束。具体到陕西“三边”教案上,我们认为靖边县小桥畔地处于陕蒙宁三省区交界处,行政权力分散,民族成分混杂,根本不可能进行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蒙兵一撤退,当地汉民也自行解散,没有一个力量的中坚。另外“三边”教案在斗争方式上的一些失策和错误行动也值得思索与借鉴。

近代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既是侵略者又是统治者,因而外国教会既是侵略组织又是统治机构。反洋教运动就是在外国的侵略和暴政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爆发不是早了,而

是迟了;次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中国人民烧毁了一些野蛮统治中心的教堂,杀掉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处决了一些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13]。所以反对教堂,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本质上都是正义的行为,它限制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基督教殖民制度”^[14]的发展,使得它毕竟没有达到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树立起西方教堂的天主教十字架的狂妄目的。同时,反洋教运动还“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5],为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积极意义将永远在中国近代史上闪现光辉。

参考文献:

- [1] 诺尔斯. 英国海外经济史:第1卷[M]. 袁绩藩,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 [2] 汤开建,马占军. 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 [3] 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靖边县志[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4] 西北大学历史系.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 [5] 宋伯鲁.(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十八[Z]. 1934.
- [6]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陕西文史资料:第16辑[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 [7] 定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定边县志:第2编[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8] 朱金甫,等. 清末教案: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 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等.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C].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10] 张应超. 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教案述评[C].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11] 顾长声. 传教与近代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12] 王明伦. 反洋教书文帖选[M]. 济南:齐鲁书社,1984.
- [13] 牟安世.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C].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15]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浅析陕北“三边”教案

作者: [张雪梅, 席涛](#)
作者单位: [延安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刊名: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年, 卷(期): 2007, 23(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5条)

1. [诺尔斯, 袁绩藩](#) [英国海外经济史](#) 1966
2. [汤开建, 马占军](#) [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期刊论文]-[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
3. [《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靖边县志](#) 1993
4. [西北大学历史系,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历史研究所](#)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1984
5. [宋伯鲁](#)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十八](#) 1934
6.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陕西文史资料](#) 1984
7. [《定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定边县志](#) 1994
8. [朱金甫](#) [清末教案](#) 2000
9. [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1987
10. [张应超](#) [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教案述评](#) 1987
11. [顾长声](#) [传教与近代中国](#) 1981
12. [王明伦](#) [反洋教书文帖选](#) 1984
13. [牟安世](#)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 1987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6
15.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 196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qsfxyxb20070201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bd462db-08db-4842-af57-9e4d009285d3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